

# 论影响中东安全的宗教因素\*

李 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 200083)

**摘 要:** 宗教一直被视为导致安全和战争问题的诸多相关因素之一。中东地区宗教和教派分歧严重,主要表现在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上。宗教对中东地区安全产生影响基本上是通过认同安全、利益安全和宗教合法性三种途径。宗教既是中东问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利因素,又是一种融合因素。如果双方都本着宽容和博爱的根本教义,为了自己的人民不再遭受苦难与流血,互相救赎、互相热爱,那么任何冲突都有希望被化解。

**关键词:** 中东安全;非传统安全;宗教因素;教派分歧

**中图分类号:** D631/B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26(2011)03-0029-05

一直以来,宗教是共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影响国际社会对行为体身份和行为建构的同时,它还可以通过建构作用影响国家安全。恩格斯曾指出“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sup>[1]</sup>可以说,宗教这一人类最古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承载着各民族深厚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必然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国家内部和国际局势中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替上升,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对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愈加重要,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作用包括个人自我身份确认的标志,影响行为的信仰体系,让人追随的正式教义,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以及宗教机构、组织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内涵。<sup>[2]</sup>美国《宗教与安全》的作者认为,由于宗教对于塑造持续性的安全观念——人们彼此间的相互认同——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为后冷战时代重要的观念影响因素,它正以特定的方式影响着国际安全。<sup>[3]</sup>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地区冲突与热点问题的背后,无不隐藏着深刻的宗教背景,甚至有些冲突本身就是宗教纷争。本文重点分析中东宗教的主要矛盾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 一、宗教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进入 21 世纪,宗教几乎已成为引发全球性冲

突最重要的动因,各种宗教狂热分子和机会主义者正在利用宗教意识形态所蕴涵的巨大能量来提升暴力的程度、范围和形式。宗教因素对现代国际关系影响的增加使得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更加关注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神学。如果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是要纠正国际政治研究对经济因素的忽视,那么,国际政治神学的建立则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对宗教、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忽略。<sup>[4]</sup>宗教是规则的主要塑造因素,代表一定的利益。当对这种宗教利益产生争执(如认同之争、圣地之争等)时,则会导致原有规则被破坏而引发冲突甚至战争。

那么,宗教是怎样影响国家安全的呢?首先,宗教作为国家行为体合法性来源之一,通过国家身份的塑造,建构安全角色的认同和塑造(善意)观念。其次,当角色认同和(善意)观念因宗教利益矛盾被打破时,宗教问题会外溢,进而引发国家安全问题。最后,宗教本身具有组织性,它通过跨国宗教活动,如传教运动、宗教恐怖主义以及人权问题等来挑战既有规则,从而影响国家安全。<sup>[5]</sup>宗教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具有以下突出特点:由于宗教关乎生与死、正义战争与战争中的正义性等问题,因此宗教与所有的冲突都有关联;与其他形式的战争相比,宗教冲突更为严重、惨烈和残忍,而且也更具毁灭性;主要受宗教因素影响的战争在时间上更为持久;宗教因素总是与某个种族(或民族)的认同、

\*收稿日期:2011-05-17

基金项目:本文属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中的伊斯兰因素”和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年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中东政治语境中的萨义德思想研究”(项目编号:KX171071)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资助。

作者简介:李 意(1972-),女,北京丰台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后。

语言、领土、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相关联。<sup>[6]</sup>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宗教和以信仰为基础的运动,人们就根本无法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sup>[7]</sup>

宗教因素之所以已经成为 21 世纪影响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的一个不容回避的变量,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一是从社会根源看,苏联解体后,苏共推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逐步退出政治舞台。于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宗教便作为一种“缺席的意识形态”登场亮相,填补真空,驱动人们去“寻求超自然的力量,为自己提供暂时的精神安全”。<sup>[6]</sup>宗教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一支新的充满活力的强大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二是人类社会在 20 世纪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复杂,宗教能够为内部包容和团结提供基础。随着宗教“非机构化”趋势的上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个体信徒和小团体倾向于“民主”宗教,“倡导独立思考,主张以个体信仰形式取代集体信仰形式”在这一背景下,“催生的宗教极端分子认为,现在社会上存在严重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是对神的冒犯,服从上帝或真主的人应当以神的名义行动起来”。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正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些自称对上帝或真主负责的个体信徒的挑战”。他们或以“圣战”方式参加武装叛乱,或以个人“殉教”形式搞恐怖活动。三是宗教出现了“民主化”趋势。美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东地区,推行强权政治和“强化民主”的政策刺激了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反抗精神。以伊拉克战争为表现形式的美国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倾向刺激了中东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使他们坚信用暴力复仇行动可以达到政治目的。美国的做法无疑会激化伊斯兰极端势力同美国的对抗,使他们采取更为极端的举动。

在全球各地,宗教信仰与利益群体的结合正形成一股日益强大的力量,宗教因素在各种冲突中的作用日渐显著。宗教信仰通常关系到一国的核心价值观,不像其他问题那样有较大的妥协余地,并且由于宗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力、跨国联系网络,使世俗权威相对化以及使暴力合法化等特性,故宗教问题较易被“安全化”,尤其在当前全球宗教复兴的背景下。<sup>[8]</sup>宗教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等三个层次都可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力。<sup>[9]</sup>宗教作为一种自我身份的确认、信仰体系、意义系统和认知框架,对个人尤其是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系列数据和案例表明,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如果过于虔诚,就可能倾向于反全球化并易于导致冲突,尤其是在其所信仰的基本价值观遭到挑战的情况下。<sup>[10]</sup>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当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冲突的印证,特别是中东地区,这个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汇之处的全球热点地区,

民族和部族问题、宗教和教派分歧、边界和领土纠纷自古以来便交错在一起,成为世界冲突的核心区域和恐怖主义多发地带。

## 二、中东地区的宗教冲突

中东地区主要包括阿拉伯民族、土耳其民族、波斯民族、以色列民族以及分散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民族,其宗教主要有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其中,伊斯兰教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宗教,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信奉犹太教的主要是以色列的犹太人,塞浦路斯和近一半的黎巴嫩居民信仰基督教。自古以来,中东地区的宗教矛盾主要表现在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上。

第一,阿以冲突中穆斯林与犹太教徒之间的夙仇被视为中东宗教问题的核心。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宗教的影响无处不在。首先,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宗教渊源和宗教文化背景,导致阿以冲突宗教化,以致阿以之间的一切冲突都带有宗教色彩。犹太教的特点是“教族合一”,他们虔信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即所谓的“应许之地”观。而伊斯兰教的特点是“政教合一”,其理念包括“圣战”等思想。“为主道而战”成为每一个穆斯林应尽的一项重要的宗教义务。当然,“圣战”思想难免会被极端分子滥用,导致了恐怖与暴力行为的发生,并成为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巨大障碍。其次,从历史交往看,双方矛盾古已有之。自伊斯兰教产生起,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就陷入重重矛盾和冲突中,宗教教义的歧义性、宗教矛盾的顽固性、宗教追求的狂热性,成为诱发、强化和延续双方冲突的重要因素。两大宗教的冲突始于穆罕默德在叶斯里布(今麦地那)传教时。那时,善于经营、财力雄厚的犹太人在该城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他们对伊斯兰教充满了鄙视,不断进行挑战,最终导致穆罕默德与犹太教的彻底决裂。以色列建国后,犹太教的“应许之地”观激化了阿以冲突,强化了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并坚决捍卫领土的决心。<sup>[11]</sup>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以色列不断扩大领土面积,进一步加深了阿以矛盾。最后,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宗教情感,特别是对圣城耶路撒冷的宗教热忱导致阿以冲突极端化和国际化,以致引发阿以之间的五次战争。作为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凝结着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的宗教感情。犹太人视耶路撒冷为宗教精神中心和自己民族的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生活家园和心灵栖息的神圣之所。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愿、不敢放弃耶路撒冷,因为放弃就意味着对自己民族、宗教和历史的背叛。<sup>[12]</sup>双方围绕耶

路撒冷的冲突不断,它所具有的高度敏感性与复杂性使之成为阿以矛盾的焦点和中东和平进程难以攻克的堡垒。

第二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一是体现在“黎巴嫩问题”上,二是体现在苏丹穆斯林对基督教徒和万物有灵论者进行的压迫和奴役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矛盾和冲突由来已久,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便是西方基督教国家向东方伊斯兰国家发动的宗教文化战争。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和西方至上主义等思潮的推行,这一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中,黎巴嫩是唯一由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居民组成的国家,由此产生的问题成为中东矛盾的一个焦点。在黎巴嫩,基督教分为天主教马龙派、希腊东正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基督教新教等派系;伊斯兰教又分为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三派,不同政党、教派和家族的纠结以及巴解各游击队伍的力量严重影响着黎巴嫩政局的变化。由于宗教、教派关系复杂,加上与以色列的民族矛盾尖锐,使得黎巴嫩一直处于中东风暴的漩涡之中。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教派之间的权力之争加上巴勒斯坦难民在黎巴嫩的存在,直接导致了黎巴嫩内战于1975年4月爆发。在此期间,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激化,与伊斯兰教派同基督教派的矛盾相交织,集中表现为亲叙利亚力量与反叙利亚力量之间的搏杀。<sup>[13]</sup> 尽管到1989年,历时15年的黎巴嫩内战终于宣告结束,但引发黎内战的根本原因——教派矛盾并未彻底解决。

无独有偶,宗教纷争也是导致苏丹内战的主要原因。苏丹北方(以穆斯林为主)同苏丹南方(以基督教徒和原始宗教信仰徒为主)之间的第一次内战始于1955年。在苏丹,占领土和人口2/3的北方是穆斯林和阿拉伯语区,北方居民的认同是他们属于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南方则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更具非洲本土属性,南方居民的认同是他们属于非洲本土,受基督教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西方倾向。由于宗教决定着苏丹南北方人的认同,南方人于是把基督教作为对抗伊斯兰压迫的最有效手段。1962年,政府颁布了传教法,全面限制南方基督教会的传教活动,基督教在南方得到了严格限制,迫使南方人不断反抗。政府军和南方军打打停停,苏丹局势一直摇摆不定。

无疑,伊斯兰教和苏丹北方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密结合剥夺了伊斯兰教在苏丹南方的优势。<sup>[14]</sup> 当北方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时,苏丹人民解放军的非洲民族主义吸引力在北方也受到了类似问题的

制约。强烈认同阿拉伯传统的苏丹北方人没有被非洲民族主义的诱惑左右。但与此同时,伊斯兰意识形态也是南方非穆斯林所无法接受的。1983年,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这次内战持续超过20年。可以说,独立后的苏丹历史是一部内战与政变交织的历史,也是一部南北差异持续强化的历史。至2005年签署《全面和平协议》为止,数十年内战共造成苏丹200多万人死亡,500多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资源丰富的苏丹从此沦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sup>①</sup>

第三,伊斯兰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众所周知的两伊战争就深刻体现了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两伊虽然都信奉伊斯兰教,但教徒却分属两大教派:伊朗有95%的居民是什叶派;伊拉克有56%的教徒是什叶派,33%的教徒是逊尼派,但国家政权长期掌握在逊尼派手中。两派在对宗教教义的解释和对政权的态度上均有不同,什叶派推崇和信奉宗教领袖,而逊尼派更愿意服从政权。历史上,两派曾多次发生激烈冲突。霍梅尼在流放伊拉克期间,与当地什叶派教士和信徒频繁接触。1979年,霍梅尼领导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朗取得政权后,遂开始对周边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此举被认为威胁到伊拉克的安全。无疑,这一由宗教及其相关因素引起的冲突,使海湾诸国关系骤然紧张,并由此引发了长达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

在伊拉克政坛上,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历来是影响伊拉克政坛的三大族群。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权力结构中,提克里特部族特别是阿布·纳赛尔(Abu Nasir)部族被置于权力的中心,占据着重要职位,掌握着绝大多数伊拉克国内安全机器——共和国卫队和共和国特别卫队。<sup>[15]</sup> 逊尼派穆斯林操纵着伊拉克政治和经济权势,其他种族和教派受到迫害。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加深了伊拉克的种族和教派冲突。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随着萨达姆的倒台,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伊拉克国内政治分裂愈加严重。2006年2月22日,伊拉克中北部萨拉赫丁省萨迈拉市的什叶派宗教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的金顶被炸毁,直接导致了伊拉克教派冲突的升级。伊拉克教派结构的历史性难题再一次发酵,凸显了宗教因素在伊拉克国家整合困境中的分量。

由于多数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是逊尼派,今后两大教派之间的争端还将继续。当前,教派冲突的影响已溢出伊拉克国境。什叶派在伊拉克的复兴

<sup>①</sup> See “Country Report: Sudan”, the Courier ACP - EU”, November - December 2001, Published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for Development, pp. 62 - 65.

已使地区教派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什叶派的方向倾斜,文化和宗教上的纽带再一次体现了政治上的重要意义。<sup>[16]</sup>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什叶派在伊拉克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地位的上升,地区内逊尼派激进势力逐步抬头。它们以不同的面貌活跃在中东各地,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逊尼派抵抗运动、阿富汗的塔利班残余势力以及巴勒斯坦的某些抵抗组织等。此外,在阿拉伯国家看来,伊朗原本被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国的逊尼派力量所遏制,尤其是逊尼派主导的伊拉克曾经是防止伊朗什叶派主张和霍梅尼思想向外扩张的缓冲区,但如今的伊拉克已由与伊朗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什叶派执政。伊朗无疑获得了历史性机会,得以扩张势力。可以预见,地区“教派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很可能会对大中东的政治产生更加直接和更加强大的影响。”<sup>[16]</sup>

### 三、宗教因素影响中东安全的主要途径

宗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既能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又能成为一些敌对势力对主权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和破坏的工具。然而,在与其他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时,宗教在冲突中总是发挥着负面的影响。例如,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宗教可以为恐怖主义披上合法的外衣,可以为动用武器进行大规模杀戮提供口实,甚至允许利用宗教的名义策动种族屠杀等。在使命感和金钱的驱动下,宗教追求成了自杀式恐怖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因。由于宗教是划分不同团体的主要特征,因此它在种族(或民族)暴力冲突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某些社会环境下,宗教甚至还会导致国家崩溃。<sup>[17]</sup>宗教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一是宗教是国际关系中跨国群体认同或身份构建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二是宗教作为“软硬兼具”的势力,以跨国观念和组织的形式冲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三是宗教是可被国际体制内各种行为体利用的合法性来源之一。<sup>[18]</sup>就中东地区而言,宗教对地区安全产生影响基本上是通过认同安全、利益安全和宗教合法性三种途径。

第一,宗教内部的认同感阻碍了对教外群体的认同感,导致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机构,宗教通过使个人接受宗教价值及信仰,参加宗教仪式和崇拜,极易使他们达到自身认同,但同时也会阻止更适合于自我的新的认同感的产生。原有宗教认同感的束缚,使个人难以叛逆原有信仰和群属而去皈依更适合于他的新的信仰与社群。宗教的认同功能结成强大的凝聚力,可使同教者亲近。但由于这种认同的专注与执着,也易引起排斥异教和同教其他教派的情绪。在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庞杂的信仰人群秉持的宗教认同包含着潜在的排斥性。在特定情况下宗教

认同可能凌驾于其他身份认同之上,损害国家性的身份认同,从而对国家安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东阿拉伯国家,超国家的泛阿拉伯民族认同、泛伊斯兰宗教认同一直对阿拉伯国家认同构成严重的困扰,国家主权规范与超国家规范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外交政策的两面性。阿拉伯国家不得不一方面坚持捍卫各自的国家主权及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从阿拉伯—伊斯兰规范寻求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sup>[19]</sup>

第二,宗教对信徒既有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控制作用,又有组织上和行为规范上的控制作用。为了满足某种利益需求,宗教对教徒的控制作用会导致教徒偏离社会的行为,促进社会解体,当这种控制与社会控制方向不一致时,就会带来社会的动乱与革命,动摇和瓦解现存社会。恩格斯曾指出“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sup>[20]</sup>中东地区的阿以冲突是最好的例证。经过几次战争,以色列终于获得了比原先瓜分巴勒斯坦决议案所规定的更大的领土,与欧洲世界的连结加深,因此也被阿拉伯人视为欧洲文明侵入穆斯林世界的象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问题也上升为全体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威望、能力和生存问题。虽然阿拉伯诸国彼此的目标和立场各不相同,但却一致宣称对旨在恢复巴勒斯坦被夺领土及消灭以色列的“圣战”表示认同与支持。阿以冲突告诉我们,只要宗教的对立不消除,中东地区就不会太平。

第三,宗教合法性可以用来为民族和解服务,但宗教教义也被认为是种族清洗和恐怖主义的“最常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宗教合法性与国家安全最直接的关系体现在宗教使暴力合法化、分裂合法化和干涉合法化等方面。<sup>[18]</sup>暴力合法化是指宗教极端主义打着宗教的旗号威胁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他们具有宗教的背景、教徒的身份,活跃在信仰同一宗教的民众中。他们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严密的组织结构,对其成员或追随者进行人身和精神控制。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利用宗教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召唤力从事反政府、反人类的恐怖暴力活动,致使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分裂合法化的出现是由于宗教具有的跨国性,使其站在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为分裂主权国家的行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苏丹的达尔富尔、英国的北爱尔兰、斯里兰卡的贾夫纳半岛(猛虎组织)、印度的旁遮普以及于2008年宣布独立的科索沃,宗教均为其分裂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干涉合法化通常是指外力因素,因为宗教具有排斥、取代异教的倾向,容易成为一些国家进行渗透、破坏甚至颠覆他国的工具。通常,国家和

地区民族与宗教矛盾的激化,都有其内外原因,而大国插手更使之复杂化。<sup>[21]</sup>由于美国在二战之后直接参与了重新塑造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历史原因,再加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漠视世界舆论和其他国家或组织的影响,在中东地区逐步确立了一手遮天的局面。不论是维护美以特殊关系的需要,还是为了确保美国中东石油供应顺畅,美国在应对中东地区最复杂的和平问题上,早已成为“主导者”,这就形成了历史和现实中不可忽视的霸权干涉与地区安全的重大悖论。

不可否认,宗教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

的极为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后冷战时代综合症之一。宗教领域的矛盾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稳定的热点因素。为了缓和这一矛盾,必须把“有约束的自由”<sup>[22]</sup>看作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必要前提。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都是教人宽容和博爱。因此,宗教虽然是中东问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利因素,但也是一种融合因素,应予以辩证地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承认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双方都本着宽容和博爱的根本教义,为了自己的人民不再遭受苦难与流血,互相救赎、互相热爱,任何冲突都有希望被化解。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58.
- [2] Shmuel Sandler. The Question of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J].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2005( spring - summer ): 293 ~ 303.
- [3] Robert A. Seiple & Dennis R. Hoover (eds. ). Religion and Security : The New Nex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5 ~ 6.
- [4] 刘骞. 论西方宗教与国家安全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9( 2 ).
- [5] Jonathan Fox & Shmuel Sandler.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63 ~ 166.
- [6] 廖百智, 增强. 美国学者谈宗教与安全的关联问题 [J]. 国际资料信息, 2005( 12 ).
- [7] 徐以骅.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0( 2 ).
- [8] 徐以骅. 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 [A]. 徐以骅.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 4 辑) [C].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7: 23.
- [9] [美] 肯尼斯· 华尔兹. 人、国家与战争 —— 一种理论分析 [M]. 倪世雄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200 ~ 210.
- [10] David Carment & Patrick James. Wars in the Midst of Peace :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Ethnic Conflict [M]. Pittsburgh, Pa.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7: 213.
- [11] 陈双庆. 犹太教理念与巴勒斯坦地域争端的关系 [J]. 西亚非洲, 2003( 2 ).
- [12] Ibrahim Mattar. From Palestinian to Israeli: Jerusalem 1948 - 1982 [J].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2, No. 4, Summer, 1983: 57 ~ 63.
- [13] 董漫远. 黎巴嫩局势演变及影响 [J]. 国际问题研究, 2006( 6 ).
- [14] 姜恒昆. 苏丹内战中的宗教因素 [J]. 西亚非洲, 2004( 4 ).
- [15] Amy V. Cardosa. Saddam's Power Structure: the Tikrit i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A]. in Iraq at the Crossroads :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Shadow of Regime Change [M].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9: 93 ~ 112.
- [16] Vali Nasr. Regional Implications of Shi'a Revival in Iraq [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4( 3 ): 12 ~ 38.
- [17] Mark Tushnet, "Religion in Politics" in Columbia [J]. *Law Review*, Vol. 89, No. 5, Jun., 1989, 1131 ~ 1146.
- [18] 徐以骅, 章远. 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途径和范式 [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4 ).
- [19] Amy Dockser Marcus. Jerusalem 1913: The Origins of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Z]. Penguin, 2008: 17 ~ 31.
- [2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86.
- [21] 姚匡乙. 对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 [J]. 国际问题研究, 2004( 5 ).
- [22] Robert A. Seiple & Dennis R. Hoover (eds. ). Religion and Security : The New Nexu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125.

## On Relig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Middle East Security

LI Yi

(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Religion ha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relevant factors which results in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and war. Lots of critical divisions on religion and sectarian have appeared in the Middle East mainly manifesting in the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sects, including Islam and Judaism, Islam and Christianity and the different sects in Islam itself. Religion influences the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mainly in three ways: the identity security, the interest security and the religious legality. As religion is either an important negative factor or a convergent one for Middle East issues, any conflicts will be expected to be resolved if both parties show redemption and love each other to make people free from suffering and bleed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 of tolerance and love.

**Key words:** Middle East Security; Non - traditional Security; Religious Factors; Sectarian Divisions

[责任编辑: 晓 春]